

# 政治经济学概论

〔法〕薩伊著

陈福生 陈振驊譯

商 务 印 书 馆

# 政治經 济 学 概 論

財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費

〔法〕薩伊著

陈福生 陈振驊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根据美国比德尔所編的普林瑟英譯本(1827年費城版)譯出

**政治經济学概論**

財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費

[法] 薩伊著 陈福生 陈振驊譯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崇 文 印 刷 厂 装 訂

·KZ· 統一书号: 4017·71

---

1963年10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68千字

印张 17 15/16 插頁 4

印数 1—2,000册

定价 (9) 3.00元

## 中譯本序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經指出：1830年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崩潰和庸俗政治經濟學興起的“分水嶺”。這是指它們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所占支配地位的更替而說的。其實，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在十九世紀初葉早已在英法二國產生了。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由於革命發展過程中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化，尤其是在雅各賓黨掌握政權時期所採取的一些激進措施，資產階級的反動本性很快暴露出來，它從反對封建貴族的革命者變成為反對勞動人民和小資產階級左翼的反革命階級了。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法國的資產階級向代表它自己利益的經濟學家們提出創立適于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任务。如馬克思所教導的，這種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特点是：“……只在外觀上的聯繫上面打轉轉，為了想要給最常見的現象以表面上也說得過去的說明，並且為了資產階級日常的需要，像反芻一樣，不絕咀嚼科學經濟學許久以前已經供給的材料，……又只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他們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自大的見解組織一下，墨守着，並稱其為永遠的真理。”<sup>①</sup>

薩伊(1767—1832)是完成這個任務的最適當的人。因為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及其大部分實際活動都同“資產階級生產當事

---

<sup>①</sup>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頁腳注。

人”有着密切联系。

薩伊出生于里昂一个大商人的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不久去英国，他的教育是在英国时期完成的。他在那里既亲自看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发展的情况，也可能讀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很吸引着他，尤其是当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他更为兴高采烈，积极拥护。但是当雅各宾党上台以后，他就离开革命而且成为它的反对者了。

在1794年到1799年間，薩伊主編《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并且在該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关經濟問題的論文。1803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学概論》。这部著作，由于反对拿破侖的經濟政策，曾被禁止重印。直至拿破侖失敗法国王朝复辟，才于1814年再版。在薩伊生前，共出过五版（以后三版，分别于1817、1819和1826年印行），几乎每重版一次都有修改。我們將要討論的这部中文譯本是按法文第四版翻譯的英文本轉譯的。

从1805年起，薩伊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新型紡紗厂。到1813年才恢复研究工作。在拿破侖失敗以后不久，他即开始讲授政治經濟学，并于1817年发表《政治經濟学精义》——这是上述《政治經濟学概論》一书的縮本。在1828—1830年間，薩伊又把他的讲稿編成了六卷本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这部巨著所論及的范围虽然很广泛，但是它的基本經濟观点則是同《政治經濟学概論》一致的。

—

薩伊的《政治經濟学概論》由《导論》和第一篇《财富的生产》、第二篇《财富的分配》、第三篇《财富的消費》共四部分构成。这种

結構就是這本書的副題所以標為《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原因。

薩伊自己是極重視《導論》的。他在《導論》中首先規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对象和研究時應當採用的方法。接着以比較多的篇幅概述從色諾芬起一直到與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止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略史。在這裡，他特別推崇亞當·斯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自己是以亞當·斯密理論的解釋者和通俗而又系統化的作家自居的。同時他又指出亞當·斯密著作的一些錯誤或缺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並說斯密的著作“缺乏條理”。在這部分里，他還批評了李嘉圖的抽象法。最後，他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認為從國王大臣們一直到普通公民都應熟悉政治經濟學。因為當統治者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對他們的各自利益知道得比從前更清楚時，他們就會發見這些利益並沒有矛盾”<sup>①</sup>。不然，則“……人民鋌而走險，……聽信惡言，建立更壞的制度”（第52頁），那就不好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雅各賓黨執政時期的激進措施，尚心有余悸，也可以看出他寫這本書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了。

第一篇雖然標題為《財富的生產》，但從內容上看，薩伊在這一篇中所論述的範圍是極為廣泛的。除生產領域的各種問題外，舉凡有關商品流通、經濟政策、對外貿易以及貨幣等等問題的討論，都包含在內。

照薩伊自己的說法，這一篇可分為二大部分。

第一部分從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止，着重說明為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各種生產要素。他從財富的定義以及財富同價值的關

---

① 見本書第50頁。以後凡引自本書的語句，均只注明頁次，不再指出來源。

系开始，并說明了生产的意义，接着分別討論他所謂的生产的三个要素：劳动、資本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然后进一步指出：一切劳动的分类；生产三要素的作用——所謂生产性的服务；分工的利弊；資本的变形以及資本的形成和增加。最后論述所謂无形产品。

第二部分包括从第十四章起以下的九章。照薩伊自己所說，这一部分是“探討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和偶然原因”（第 136 頁）的。他首先肯定了，只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才能發揮其最大生产力。其次，发表了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謬論。他在这一部分中討論对生产发生作用的各种外来原因时，着重反对了政府的干預經濟活动和拿破侖的經濟政策，論证“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第 189 頁）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第 186 頁）这种資產階級生产当事人的平凡而自大的“真理”。最后，以二章的篇幅闡明貨幣流通和信用問題，也不过“咀嚼科学經濟学許久以前已經供給的材料”而已。

第二篇《財富的分配》。薩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說明价值、收入的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怎样进行，并分別闡釋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最后提到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

第三篇《財富的消費》。薩伊首先說明消費的种类和結果，然后提到个人消費的动机和結果。他在这一篇中所着重探討的是所謂公共消費。但实际上他所說的是关于国家开支的各种費用、課稅和國債等財政問題。

## 二

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家把薩伊在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捧得很

高，认为他是亚当·斯密学說的继承者和在西欧大陆的傳播者，并把他当作古典經濟学家之一。他們所根据的就是薩伊的这部《政治經濟学概論》。

亚当·斯密在《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固然是以財富即物，以及物与物之間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但他所着重研究的是在资产階級社会中的財富，也沒有故意避而不談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混同起来，而不知道，人們之間的关系是通过物的关系表現出来的。薩伊在这本书的《导論》中一开始讲到研究对象时，就特別強調政治經濟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則的政治学”（第15頁）分离开来。就是說他主張經濟同政治分开，使經濟活动免受政治的干預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他所以会抱这种主張，誠然是借此来反对拿破侖的尤其是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政治，而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抽去社会和階級的具体內容而抽象地空談一般經濟問題，以便于掩盖資本主义的內在矛盾和資本家对无产階級的剝削关系，从而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論而奠定了资产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基础。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的著作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因素。薩伊所继承的只是其中庸俗的因素，而对其中的科学成分則或者棄置不談，或者加以反对。

亚当·斯密的著作虽然是有許多缺点、錯誤和矛盾的，但它有自己的邏輯体系，而且研究的对象和总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始終貫徹全书的。可是，薩伊并不懂得《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书的邏輯結構。他在評論这部杰出的著作时指出：它“……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不齊整的奇妙的創造性理論”（第19頁），“許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都缺乏条理。要想透



彻了解他，就必須把他的見解加以整理，細細体会”(第 31 頁)。

看来“整理”是必要的了。薩伊是从这門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整理”的。他說政治经济学是“闡明財富确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費”(第 48 頁)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彼此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而在談論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經濟形式的范疇，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疇，用这种空洞的廢話来抹杀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sup>①</sup>。薩伊正是抽去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階級剝削关系而空洞地談論生产的。这样，他就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按照所謂自然規律建立起来的技术科学了。用这种办法来为資本主义制度辯护当然是很方便的。无怪乎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学家要把薩伊捧上天，认为他是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創建者。他的这种分部法，在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稍加变更地(有的略去消費而添上流通，有的則划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費四部分)沿用很久，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消費和分配是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产、分配和消費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分配和消費决不能离开生产而又彼此分离各自独立。所以，薩伊的这种分部法，只不过标志着亚当·斯密理論的庸俗化而已，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

可見，薩伊固然是亚当·斯密理論的繼承者，但他所繼承的不是斯密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因而决不能把他算作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学家之一，他是繼承而且还“发展”了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因而只能把他看作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倡始者之一。

<sup>①</sup> 列宁：《評經濟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66 頁。

## 三

薩伊既然抽去了社会經濟形态和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就只好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談論生产問題。他认为除任何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用的像阳光、空气等天然存在的物品以外，凡是能够用来满足人們各种需要的物品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創造出来的。他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因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們的需要。因此，“所謂生产，不是創造物质，而是創造效用”，“人力所創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第59頁）。

他认为由于生产出来的物品具有效用，因此人們就給这种物品以价值。照薩伊的說法，物品价值的唯一基础是它的效用。很明显，他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薩伊所說的效用）混为一談了。这种观点当然是极錯誤的，因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价值存在的物质条件，但决不是价值的基础。如果再考虑到亚当·斯密已經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則薩伊这种見解的錯誤和庸俗就更清楚了。但这一点对薩伊來說是很重要的。因为薩伊的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論，而且是他用来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論的工具和引出他自己的生产三要素論的根据。

誰都知道，使用价值絕不是人的劳动所能单独創造的，薩伊既然把它和价值混同起来，就一定会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論。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論，一切財富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劳动又是价值的尺度。薩伊认为，斯密的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在他看来，“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資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第75頁），不能仅归因于劳动。

这样，薩伊从他的效用是价值基础的“理論”引伸出生产三要素論。他所理解的这三个生产要素都沒有历史的和社会階級的具

体内容,而只是指劳动一般、生产资料 and 自然力尤其是土地。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只要进行生产就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被抹杀了,它的种种矛盾和阶级的剥削关系当然也就都被掩盖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

其实,李嘉图在当时就早已指出:自然力只是同产品的使用价值有关,它对于价值是毫无关系的;生产资料也不能创造新价值;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唯有人们的劳动。所以,萨伊这种“理论”的错误,很早就已被指出来了。<sup>①</sup>但是由于它很适合于辩护的目的,才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总之,依照萨伊的观点,生产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共同协力生产出物品的效用,这种效用就成为该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萨伊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效用论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的。

但是价值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因而成为价值基础的效用也不能不有量和尺度单位问题。我们要问:效用的量的大小如何决定?究竟用什么尺度来测定它的大小?萨伊不但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到需要强度、效用强度等一些废话。不错,他倒是提到过效用的尺度。他说:“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第60页)。萨伊是坚持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的,那么他如果在逻辑上能够贯彻这种主张,本来应当告诉我们:由效用来测定价值并作为价值尺度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他以及他以后的所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无论怎样探索都不能找到可以测定效用大小的客观标准尺度,因为这

<sup>①</sup> 例如李嘉图对萨伊的这种“理论”所指出的错误。参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3页。

种尺度单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他只能因果顛倒地說什么：倒是价值成为效用的尺度了。

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决。我們仍然要問：价值本身的大小究竟如何决定呢？他說：“价格是測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同上）。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定量某种商品所付出的貨幣。这一点薩伊也是同意的。既然如此，价格理应由貨幣和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价格虽然可以表现出商品价值的大小，但必須以商品价值和貨幣价值为基础。薩伊在这里把价值的大小如何决定的問題同价值大小如何表現的問題混同起来，并以后者去替換前者了。

即使如此，問題还是得不到解决。我們还是要問：那么一种商品的价格又由什么并如何决定呢？他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說：“在一定時間和地点，一种貨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給的减少而比例地上升；反过来也是一样。換句話說，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給成反比例”（第325—326頁）。

这样，薩伊当他的效用論不能說明問題时，就不能不借助于庸俗的供求論了。我們都知道，供求关系的变化只会引起价格背离价值而上升或下落，这种关系决不是决定价格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对这种庸俗的“理論”曾不止一次地予以严厉的批評。他曾这样写道：“如果需要与供給互相均衡，它們就不再能說明任何事物，就不会影响市場价值，讓我們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場价值恰好表示为这个貨幣額，而不表示为别的數額。”<sup>①</sup>

薩伊在这本《政治經濟学》中不仅在許多地方談到供求論，同样，他还在不少地方談到庸俗的生产費用論。他认为生产費用是

---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8頁。

价格的基础，是价格的最低限度。他曾說：“如果一个生产事业的产品不多于它的生产費用，那便沒有新价值的产生，因此也沒有新财富的創造”（第 218 頁）。他所說的生产費用是由工資、利息和地租构成的。依照薩伊的意見，构成生产費用的这三个因素分别是使用生产三要素所支付的代价，这样，为了說明生产費用又不能不考虑生产三要素的价值如何决定的問題了。

薩伊有时又把生产三要素叫做“生产手段”或“生产来源”。

当薩伊断言效用是价值的基础时，他是从物与人之間的关系来考察的。就是說，他认为商品能够直接用来滿足人們的需要，可以供人享受，有效用因而也有价值。但是有些生产来源例如一块地或一件工具是不能直接供人享受以滿足其需要的。那么，它們的价值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这个問題倒是为薩伊所注意到而且予以解釋的。他說：“它們（指生产来源——引者）的价值基于它們所能創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指产品价值——引者）本身則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第 330 頁）。①

本来，生产費用論是一种沒有出路的循环論。如果我們可以吧庸俗的生产費用論叫做小迷宮的話，那么，薩伊的价值論就可以說是大迷宮了。当他不能依靠效用論解决問題的时候，就求助于供求論；供求論失去作用的时候，他又陷入生产費用論；在要彻底說明生产費用即要說明所謂“生产来源”的价值的时候，他已回到效用論了。轉来轉去，始終找不到出路！

虽然如此，薩伊的“服务”也还是有所“貢獻”的，那就是他把早已有人发表过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論，收集起来，左右逢源地灵活运用，借以反对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劳动价值論，掩盖資本主义的剝削

① 順便指出：薩伊的这种由产品价值决定生产資料价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庸俗生产費用論恰好是矛盾的。

关系。

#### 四

薩伊的分配論是以他的生产三要素論为基础的。根据他的理論，生产有三个要素，它們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协力，各自發揮其作用而表現生产的性能。这就是人的劳力、“自然的劳力或自然的生产性服务”和“資本的劳力或資本的生产性服务”（第 77 頁）。

这三个要素所有者由于它們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資、利息和地租。由劳动的服务产生工資，資本的服务产生利息，土地的服务产生地租。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予以全面分析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劳动——工資；

資本——利息；

土地——地租。

照薩伊的說法，無論什么时代和無論什么地方，进行生产就必須具备这三个要素，而它們的服务也必然会使其所有者取得相应的收入。这样，他就把資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消除而使它們变成为絕對的和永恒的收入形式了。

亚当·斯密曾經明白地指出，利潤和地租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的扣除部分，因而他“已經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認識了”<sup>①</sup>。而薩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則表明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三种收入是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剩余价值就完全被抹杀了。这样，薩伊完全拒絕了亚当·斯密理論中的科学成分，而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的“利益調和”論打下了基础。

---

<sup>①</sup> 馬克思：《剩余价值學說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41 頁。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在分配問題上有科學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薩伊這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完全拋棄了斯密的科學觀點，而利用其庸俗的見解。這首先在工資問題上表現出來。

亞當·斯密一方面認為工資是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的一部分，這樣就有可能揭露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另一方面他又不加批判地使用“勞動價格”這個術語，認為工資就是勞動價格，從而又掩蓋了那種剝削關係。薩伊既然斷言工資是勞動服務的報酬，那麼勞動者已得到他所應得的全部代價了，因此，他們並沒有受任何人的剝削。不僅如此，他還硬說，低工資對於全社會都是有利的。他在反對西斯蒙第關於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的建議時曾說：“所謂低的工資率只對雇主有利的見解是不正確的。工資率的降低和跟着而來的競爭的不斷作用，必定使產品價格下降，因此從工資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費階級，或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第383頁）。這種論調的錯誤是極其明顯的。這裡只指出一點就夠了，即：它同薩伊自己的效用論也是矛盾的。因為商品價值的基础既然是效用，而工資的降低決不會使商品的效用發生變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影響商品的價值。這種“理論”雖然是極其錯誤的，但由於它是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強辯的一種工具，所以一直到今天還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採取。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家，還利用它作為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武器。例如，所謂凍結工資政策和以反對通貨膨脹為借口而限制工資的措施，都是以這個“理論”為武器的。

薩伊不但否認工人被剝削，而且還把工人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等同起來，認為他們都是勞動者。他把人的勞動分為三類：1. 哲學家或科學家的勞動，其任務在於闡明理論；2. 農場主、工廠主或商人的勞動，其任務在於應用；3. 工人的勞動，他們“在前兩種人的

指揮監督之下提供執行的力量”(第70頁)。照薩伊的這種說法，工人和企業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他們都是勞動者，不過前者的任務在於“執行”，而後者則以“應用”為其任務。由於“應用”比“執行”更複雜更困難，因而企業家所得到的工資比較工人的高些罷了。這樣，他又把亞當·斯密的利潤論庸俗化了。

亞當·斯密曾經指明：利潤是歸資本家所占有的、從工人所生產的產品或其價值中扣除的部分，利息是從利潤派生的。薩伊把利潤劃分為“資本的利潤跟使用資本的勞動的利潤”(第400頁)二部分。前者是“對於資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第394頁)，即資本生產性服務的報酬，這其實就是利息。後者則是企業家即薩伊所說的冒險家經營管理等勞動的報酬，這就是企業家的收入。儘管他在本書中說了一大堆利潤，例如什麼“一般勞動利潤”、“資本利潤”和“地產利潤”等等，實際上，他已把這個經濟範疇取消了。因此，依照他的觀點來說，“三位一體”公式中所包括的一個公式，不是資本——利潤，而是資本——利息。

薩伊一方面漫無邊際地使用“利潤”這個概念，另一方面又於實質上取消了它。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都在追求同一個目的，即便於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並且為“利益調和論”奠定基礎。

薩伊擴大“利潤”這個概念是同他擴大“資本”這個範疇有着密切聯系的。在他看來，不但像工具、原料等等生產資料，連同工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和貨幣都是“屬於生產資本的範疇”(第70頁)的，而且認為工人的生產技能連同“做公務員的本領，也是一種積累的資本”(第130頁)。這樣，就必然會得出“就是普通工人，通常也自己預付一部分資本”的結論。照這種見解來說：既然工人也有“資本”，他的勞動也有“利潤”，那麼，他同資本家還會有什麼區別呢？在他們之間哪里還會有被剝削和剝削的關係呢？



另一方面，薩伊把利潤分解為利息和企業家的收入，這二種收入是由不同的來源產生的。這樣，他以為可以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了：既然企業家的收入是由於他們的管理和經營企業的勞動，那麼，其性質就同工資是由於普通工人的勞動是一樣的。他們之間當然就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更說不上有什麼剝削關係了。同時，利息和企業家的收入既然由不同的來源產生，當然，在貨幣資本家和機能資本家之間也沒有什麼利益衝突了。這樣，他又把這二類資本家在瓜分剩餘價值問題上所暴露出來的矛盾掩蓋起來。

這個庸俗經濟學家如此“巧妙地”掩飾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膿瘡”，把它說成多麼和諧！無怪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庸俗經濟學家們都要拍手歡呼他的著作，把他捧上天了。

可是，美妙的夢總是做不長的。薩伊的這種“妙論”不但在理論上毫無根據，而且也早為資本主義的現實所粉碎。我們在這裡，只指出二點就夠了。第一，無論薩伊如何說普通工人也有資本，甚至一個人本身也是“由每年用以教養他的款項累積形成”的資本（第375頁），但工人始終是受雇者和被剝削者；2. 在薩伊時代的法國已經有股份公司形式的資本主義企業，儘管資本家並沒有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卻依然獲得利潤——而且在通常情況下，這種利潤總是高於利息的。這種事實無情地擊破薩伊的關於工人和資本家沒有利害衝突的“美夢”。

薩伊在地租問題上，不但庸俗化了亞當·斯密的地租論，而且他自己還發表了前後矛盾的見解。他一方面認為地租是土地的生产性服務的報酬，亞當·斯密的關於地租是從勞動生产物或其價值中扣除的一部分的論點，即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種表現形態的論點，完全被拋棄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地租是地主節約和發揮智慧的結果。他說：“一個土地所有者，由於注意，由於實行節約和